

雷鸣远神父

(一八七七——一九四〇)

雷鸣远神父，原籍比利时，于一九二七年申请归化入中国籍。由于雷神父久居天津，被称为天津人。雷神父一生酷爱中国，当他还是儿童的时候，遇到传教士回欧为中国募款时，他必把自己所储蓄的零用钱全部捐出，且在他卧室周围挂满中国人像，偶然在报章杂志中见到有关中国的图片，他必剪下，保存起来。

雷鸣远于一八九五年入巴黎遣使会，一九〇一年春抵上海，翌年十月在北京晋铎。一九一二年被调往天津工作，并创办广益录(后改为广义报)，提倡新知识。雷神父更积极推动教友传教，成立公教进行会，鼓励教友直接参与传教工作，又成立女子公教进行会。一九一六年出版益世报，主张多用语体文。

一九二七年，成立耀汉兄弟会及德来姊妹会，主张“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而会士的训练则着重精神、技能、社会、生活四方面的培育，并且强调会长应为众人的公仆。他们的团体希望能做到：各尽所能，自给自足。因此，他们设有印刷、缝衣、编织、木工等部门，另外于工余时间，办周末施食会、平民学校及盲人院等。雷神父于一九三三年七月离开遣使会，翌年加入自己创立的耀汉兄弟会，并发圣愿。

七七事变期间，雷神父为耀汉会立了遗嘱：“时已迫矣！数月后，欲若此夜之清静写字，或不可得，安国失守后，仆虽未必死，然亦未必活。”可知雷神父早有为国牺牲的决心。

一九三八年春，传说有人愿出重资购买益世报，筹备复刊。雷神父立即郑重声明：“益世报为中国公教之言论机关，绝对不致对敌人屈辱降服，鸣远一息尚存，当不让一己所创造的报纸，有向敌人屈辱降服之事实发生。”

一九四〇年初，雷神父在战区的服务团工作，因工作过劳而病倒，终于在同年六月廿四日病逝歌乐山。

1989年1月6日

雷鸣远神父速写：百年诞辰纪文

赵雅博

我为中国而生 我为中国而死

雷鸣远神父，是一位黄发碧眼的比利时人，生在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九日。说也奇怪，他却有一颗中国心；在十一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中，他读了一本记载法国教士董文学在中国殉教的历史，便立刻决定了要到中国来作传播福音的工作。从那时起，他心中便涌溢着热爱中国的心，为中国的利益而工作！

一位实行家

雷鸣远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行家，说到作到，绝不肯说作不到的事。他的一生真可说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没有任何困难可阻止他实行他的志愿，他一生有一个最大的嗜好：吸烟，曾说过“没有烟的生活不算生活”的奇语，然而他再度回到中国以后（一九二七年），为了创立修会团体，毅然戒掉；他创出了修齐的格言：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一个全，一个真，一个常，都是完全、彻底，不折不扣的意义。在中学读书时，他的老师给他一个评语是“无限努力”；读书作事，他都是认真不苟，要求作得尽善尽美。他有一句奉行终身的格言：“我有百分的力量，不用九十九分”。有一次他写论文论法国，写的是那样的好，老师在朗诵过后，冲口便说出：“这是抄袭的！”另一次，他在上课时老师引证课文有所不符，于是他查对原书，老师愤怒了，要他上台教授这一课；在一位同学鼓励下，他走上了课堂，讲授了教授指定的那一课。他讲的非常明白，非常清晰，引经据典，毫不生疏，由拉丁文而希腊文，而犹太文，背诵如流，这个不也证明他的读书认真吗？

我与中国人一条心

他因读书太多，又克己过甚，害了脑病，眼病，羞光怕亮，听课无关，阅读不能，上司曾派遣他到罗马听课，不过三个多月，可是，后来他在北平万寿山陪伴一位意大利人参观，参观完了，那位意大利人竟问他是不是意大利人？又有一次，他出席宋哲元将军的一个会议，宋的一位贴身团长，对他说：“雷先生的中国话真是中国话”，他毫不考虑的回答说：“团长的鼻子真像中国人”。要作就作得完全是，要学就学得完全真。他初到天津，看到了洋人们对中国人的蹂躏，他发觉了义和团的兴起，错不在中国人，而曲在西洋各国，他认真地说了一句：我与义和团一条心！

一条发辮

中国人在当时还留发辮，他的头发不够长，他愿意一下子变成标准的中国人，于是写信与他发色一样的妹妹，要她剪下头发来，借给他作发辮，等到民国到来，发辮废掉，他将自己剪掉的辮子，奉还给他的妹妹。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他穿衣，吃饭，穿鞋，读书，都是中国式的，一袭布衫，走遍中外；一部四书，一周来复。在窄面鞋时兴的时候，他真的削足适履，将脚压成了病，要中国化就彻底中国化。眼睛，鼻子，是没办法改变的。在骑脚踏车，跌伤鼻子之后，他曾开玩笑的讲：现在鼻子低了，更像中国人了！他说：“不要看我的眼睛，不要看我的鼻子，要看我的心，它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比中国人的心还更中国化！我们对于我们的国家，牢骚抱怨，诸多不满，而雷神父对国家的一切，皆往好处看，与其牢骚误事，倒不如奋力自强，自我改善，每个人都抱着自我改善的决心，国家自然可以完全改善。“今日始，自我始”。

人人如此，国家自然臻于富强，政治自然入于轨道。真的，他比中国人更有中国化的心。一般外籍传教士，往往以披露我国的缺点、贫穷，来争取外国教友的同情与慨赠；而雷神父则是以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的深厚，作为报告的资料。有些天真的外国人曾多次问他：“中国人这样好，我们为什么还要协助他们呢？”他回答：“只差信仰了，协助他们一点点，便走向真信仰，不是更该协助他们吗？”隐恶扬善，是任何君子应该作的事，又何况一个有爱的人呢？

爱，爱，爱，爱

爱，雷鸣远一生最强调的是真爱，他从最初到逝世，一方面想尽办法要信仰宗教的人，显示他的爱，另一方面，他自己更在显示自己对人类无限的爱，对真理无限的爱。

他初来中国，传教京东的时候，便说服了一个村庄的信友，宽恕了一个杀害信友亲朋的拳徒。这还事小，最重要的是让这位义和团的恩师，宽恕了他的拳徒，他，这个忘恩负义，恶迷心窍的人，曾将他恩师的子孙儿女，一家七、八口，完全杀死，血海深仇，如何化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雷神父以无比的爱要求这位被害人，终于宽赦了他的叛徒。结果如何呢，这位叛徒，不但能悔过自新，并且在从军之后，劝服了几百位国人，信仰了宗教，最重要的是让这个浪子，完成了金不换的回头。

他本人呢，我们要怎么说，他的秘书，雷震远先生，对他的爱曾说过一句耸人听闻的话：“一个怙恶不悛的爱人者”！爱人得而加上了怙恶不悛的形容词，真可说是从古未有了。

“要爱人就得上当，受骗，吃亏”，这并不是说，他故意的受骗，上当吃亏；而是说，在一个人需要他协助时，他从不考虑是不是有受骗的可能性，协助人是义无反顾的事。我们且举几个例子：在天津传教时，有一个人要开一间天主教的书局，雷神父出资协助了他，结果在赚了钱之后，他花天酒地的将钱花光，并且一走了之，后来被教友捉住，剥掉衣服，大加私刑。事被雷神父看到，他装作大发雷霆，要亲自惩罚罪魁，引到自己房间，罪犯大哭求饶，雷神父立刻取出衣物，并给他一点钱，要他重新作人，赶快逃走，教友们知道了，抱怨他，他说：“人孰无错，宽过是我们的天职”。又一次，北平某慈善家，送给他一件新棉衣，要他不能给人，并为他雇人力车送到寓所，他看到车夫衣单寒冷，立刻将新衣给了他！

抗战时期，他成立精神总动员督导团，一位团员在辱骂，威胁，并携款私逃之后，雷神父不但没有追究，并且还替他还了公款，因为他认为关山间隔，路费不足，还写信给沿途教育当局，请他们协助他，结果使这位逃犯，感激涕零，幡然改过，重新加入救国行列！

一个被日军收买了的汉奸，要刺杀雷神父，事发被捕；雷神父致函当局；依照国法，自无异言，但是站在他本人的立场，他宽恕他并希望从轻发落，最少不要课以极刑，结果那人性命被保全了，胜利后也获得了自由。

至诚无伪

雷神父作事认真，从不苟且，这是出于他至诚的天性，至诚的德行。至诚可以格天，至诚绝无虚伪；一个一向自许为“高级文明”的西方人，在清末时代，能不轻视我国，已经是一件大幸事，尊重谈不上，爱更不用说了；在那时，如果你是一个西班牙人，你说你爱东方的中国，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所有认识雷神父的西方人，没有人不说雷神父是怪物的，理由是他竟然爱中国！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七年间，他在比法瑞荷德英协助我们的穷留学生时，对学生的爱护，超过了父母之于亲子，不要说外国人不信，就是身受的中国人，也不太肯定，在鲁汶（比国一小城，有名大学鲁汶）的信件档案中，我们曾看到向他求助，而又怀疑他的爱是伪装的信，有好多件，但是到最后，就是那怀疑他的人，也由衷的说出：“他的爱是真挚无伪的，他视我们如己之子，一位作妻子的向她的丈夫说：“你对雷神父的孝，超过了对父亲的孝”，她的丈夫回答说：“他对我的爱，超过了父亲对我的爱”，一位留比的同学，买了一支手枪，计划在一旦发现了雷神父对中国的爱是伪装的时候，便要将他射死，结果他在汉口见了雷神父的真诚的爱，将手枪奉上给雷神父，作为证物。

雷神父在庆祝六十二大寿时，他说了一句话：“我的一生待人接物，就是一个诚字”，实在，他一生待人以诚，办事以诚，读书以诚，爱国以诚，至诚无伪，至诚感天，他在西安日军俘虏营中，一次演讲，竟使顽固的日军，很多纷纷改变，大书“打倒日本军阀”！

接近雷神父的人，都为他的诚恳所吸引，很多人在抗战时期，只要听过他的谈话，都应该立刻放下工作，从事抗战。

诚于中，形于外，在爱国抗日上，他表现得使人难以想像；在火车进站要停的时候，他看见两人在争吵，人们围了一团，无法拉开，他伸出拳头，喊了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时间群情激昂，喊声震野，两个打架的人，忘掉了打架，也随着人们喊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安圣堂，圣诞节大庆日，由雷神父讲道，他第一句话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人们很惊奇，在圣堂讲道的庄严景况中，如何能喊这样的口号，雷神父接下去，讲述了耶稣终生的革命精神，抗暴行动无一不是从事打倒魔鬼的帝国主义啊！

抗日成圣

抗战初期，一个教会学校，请他作三天的精神修养指导，他的中心思想；竟是“抗日成圣”，成圣在天主教是最高境界，是最神圣庄严的工作，他竟而适用到抗日上，不是一心一意爱中国而出于至诚的人，又谁能想到这点，并能如此活用教会的精神指导呢？

中国人归中国人

他为爱中国，提高中国在教会中的地位，奋斗了大半生，受尽了无数的折磨，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几乎可以说是非人所能承受，然而他为了爱中国，他一一忍受了，即使到他的爱中国的思想成了事实以后，他的精神折磨，仍是有加无已。他从无怨言，一直勇往直前；提高中国在教会的地位；就是要教会中国化，要教会的首长主教是中国人。在当时，在雷神父来华以前，在明末天主教传入以后，教会最高当局，等待时机，使中国教会中国化，但是所有的西方传教士，他们也是人，目睹中国的积弱，西方的日强，优越感在暗地作祟，恶魔在背后捣蛋，除了一二少极少数的人外，都不认为中国人有作为主教的资格。庚子年后，大战方停，军阀分裂，西洋人更是反对提高中国在教会中的地位！雷神父孤军奋斗，外国人方面，只有一个汤作霖协助，阻力之大，连教会罗马最高当局，都感到非常棘手，然而雷神父一直的再接再厉，最后终于成功：中国归中国人，使中国人脱离了精神殖民地的状态。现在，我们应该秉承雷神父遗志的：就是该将所有的哲学，科学，也都中国化起来，使我们的教育文化，脱离西方的殖民地状态，而走向自主！不再以英文教本为原本，而是应以中文本为根基，教育部，编译馆，国科会，应该大力的朝着这个方向走，而不应该自甘堕落，作西方文化的殖民地！这件事情，看上去也许不那末重要，然而实际上，这乃是我们要独立于天地间的最重要工作！

天下无难事

雷神父的至诚，雷神父的彻底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作事只有积极，决不退缩，天地间没有不能完成的人事，只要您愿意，他常昭示于人们的是：“世界上没有没办法的事，不办才是无法”，任何事件，只要他愿意，他便不顾一切艰困，只知向前，不知退后，迟迟早早，总要完成，迟迟早早，总要达到他的志愿。他组织救护队，完成了救护队史上所未曾完成过的事，一个伤兵也不丢掉，与伤兵共存亡。他组织督导团，深入敌后工作，唤起民心，收效无限。他组织过游击队，一团劲旅，三天内不能完成的攻击，一连散卒；三个小时之内，兵不血刃，逼走了顽敌日军。剿共时期，雷震远等秉承他的遗志，在石家庄的附近，以一排的公教军，先消灭了刘百承的一营兵力，后来以二十八名健全士兵，与共军三团之众，在韩潼苦战了三天，结果还有十几名归队到石家庄。

死而后已

雷神父的至诚彻底精神，表现在他整个一生的行为中，他从不失望，从不为折磨与痛苦所屈服。朱德在致他的信中，恫吓他，威胁他；刘伯承在扣留他的时间，想尽办法，给以精神的折磨，然而更坚定了他反共的心。人们只认为死而

后已，但是他不认为死了就死了，他坚定的说，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死了还是要干！

今年是雷神父冥寿一百年，霎眼即到，缅怀先贤，蒿目时艰，我们不只该以文字纪念这位精神不死的老青年，我们更应该以行为来表彰他，来追随他，来实行他的志愿，而不要只以文字，口号，宣传，我们却要个个成为雷鸣远！

1977年6月24日

雷鸣远神父血泪的结晶

耀汉

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庆祝我国首任六位国籍主教祝圣六十周年纪念大会时，使我想起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五日我国主教团在台北市体育馆举办的万人为国“祈福大会”。当时教宗特使金寿焕枢机在致词中特别提到我国首任六位主教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廿八日在罗马祝圣典礼中，雷鸣远神父流着快乐的泪说：“这一时刻把我一生所淌的痛苦眼泪都擦去了”。

一九三二年秋，雷神父曾奉宣化教区第二任国籍主教程有猷主教之命向大修院师生讲述他倡导“国籍教区”的奋斗史，人们称呼这段奋斗史为“听命革命的一滴血”。

当然，促使首任国籍主教出现的人，不只雷神父一位，而且雷神父也不一定是主角，但是他对成立国籍教区曾付出不少的心血与泪水，却是公认的事实。

哭吧？乐吧？流泪吧！

一九二六年十月，六位首任国籍主教到罗马等候祝圣时却不见雷鸣远神父的影子。当时传信部长王老松枢机急了：“任何人不来参礼都可以，惟独雷神父不能不来！”于是他打电报问雷神父，回电很简单：“没有长上许可，我不能去罗马参礼。”

没有几天，雷神父的长上忽然意外的收回成命，催雷神父立刻去罗马。

雷神父以后向我们述说他当时的反应说：“我一得命令，就像箭一般的飞奔圣京！”

六位主教听说雷神父已抵达罗马，虽然正在举行晋牧前的大避静，但因急欲向他表示感激及慰问，立刻召见了。六位主教把身材矮小的雷神父围在中间，你一言、我一语地慰问他为促进国籍教区的成立二十多年所受的种种痛苦，使雷神父感动的涕泪交流。

在祝圣主教典礼中，雷神父被安排在贵宾席第一排，他以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当礼节一开始，我仿佛入了梦境，又像升了天堂，我不能说完全没有看到礼仪的进行，但我的泪眼模糊，我的思潮零乱，我的心有时很激动，有时却十分舒适安静。我觉得有几分醉意，我已不知身在何处。……礼节进行了近四小时，在我的感觉上，好像只有几分钟。

“礼节终了，六位新主教头戴峨冠，手执权杖，降福在场的群众，只听一声：‘中国主教万岁！’有如晴天霹雳，震撼了伯铎大殿。我初次看到白种人跪在黄种人面前，我的心好似停止了跳动，眼前又是一片模糊，耳朵也听不见了。……我真的陶醉了。

“忽然，陪我来观礼的司塔斯先生动了我一下（笔者按：司先生是当时比国银行界闻名教友，曾捐献雷神父六十多万元资助留法比的中国学生），我擦了擦眼睛，唉呀！王老松枢机出现在我眼前。老枢机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雷神父，你快乐吧！继续流喜泪吧！’我套用圣经的话答谢王枢机说：‘主啊！现在可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世了！’老枢机急忙又说：‘不！不！你还该活下去，还有许多事要作呢！’”

“司塔斯先生为让我享尽这个快乐，而又不受人的扰乱，特雇了一轮马车，他说：雷神父，快上车，在里面默想吧！乐吧！流喜乐的泪吧！”

“车慢慢地走着，我二人在车厢内相对无话，马车载着我们在城内绕来绕去，也不知走了多少时刻，到了司先生的旅馆，停住了，他说：雷神父，享够了你的幸福吧？”

“我才由梦中醒来，天色已近黄昏。”

一步一滴血

被誉为“中国教会新纪元”的“一九二六．十．廿八”，雷神父整天的喜乐并不是幸致的，而是他二十年绞脑筋、耗心血、流眼泪、淌鼻涕的结晶。

如所周知，他为促进“国籍教区”的成立，失掉了上司的依重，丢掉了同会弟兄的爱戴，丧失了副主教的荣位，被迫放弃传教工作蓬勃的大好园地——天津，各处流浪……。——他戏称这是他的“巴比伦的流放”。

一次在他写给宁波教区赵主教的“万言书”内，坦白承认自己走了漫长艰苦的岁月，他说：“我的血多次流在荆棘上”。他也向他母亲写了类似的话：“我倾了不少的心血。”

雷神父一生，特别为了推动“国籍教区”的成立，真可以说，他和耶稣一样——“一步一滴血”。难怪人们称呼他的奋斗史为“听命革命的一滴血”。

他为什么要这样？为成立正式的“地方教会”，使中国人容易归依基督。

但是，他面对种种挫折，不灰心、不消极、不悲观，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是默默地、微笑着、积极奋斗、勇往直前。

雷神父虽然只知耕耘，不问收穫，但慷慨的天主让他收到了成果，而且在今世（一九二六年．十．廿八）就亲眼看到了他的“血泪的结晶”。正如圣咏所说：“含泪播种的，必含笑收割。”

雷公簡史

雷鸣远神父，一八七七年生于比国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十一岁时见到中国风光的图片，即爱上了中国。廿四岁来到中国，学中国语言，写毛笔字，穿中国服装。廿五岁在北平晋铎，先后在天津、安国等地传教。五十岁入中国籍，他说“不要看我的鼻子和眼睛，要认透我的赤心，我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他的口号是“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一九二八年创立耀汉兄弟会，

德来妹妹会，并在比国创立“辅助传教会”及“鸣远女子服务团”。会训是“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这四个团体至今在全球各地为社会服务。

雷鸣远神父在抗战期间曾亲率修士、教友到战地抢救伤兵，救济难民，并教育失学儿童，组织民众参加抗战。一九四〇年他的耀汉会修士十二人被共军惨杀，他也遭共军诱禁四十余日，受摧残以致患病，获释后至是年六月廿四日在重庆歌乐山逝世，并葬于歌乐山，建有纪念碑。一九七八年九月三日雷公的牌位入祠台湾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

寻墓

一九八〇年耀汉会鲁道修士去歌乐山访查雷墓，但墓与纪念碑已不知去向。经多方查询，知棺木早被人取去，留下遗骸及念珠等也不知在何处，只是墓的地址终于确定，经挖掘了两天，正想放弃时，忽然掘出一罐，内有西人头骨，念珠钮扣，祭衣的花边等，证实是雷公遗骸及遗物，于是将遗骸密封，深埋原处，坟前竖一石碑。

去年十月下旬该会梁熙迹修士由美去重庆，三十日和鲁道修士及十多位教友攀绕上山，数小时后到达雷公墓前，诵经祈祷高唱圣歌，求主赐这位一生荣主救人，死而不已的雷神父。“全、真、常”及真干、硬干、苦干的精神永远照耀人间。

鲁道修士说：这山坡，已命名为“万桑坡”（因雷公圣名为圣万桑）并将多植桑树，为纪念雷神父。

1987年3月6日

雷鸣远神父对中国教会本地化的贡献

董立

(一) 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

现代中国宗徒雷鸣远神父是一位先知先觉、大智大勇的人，也是一位充满传教热诚，热爱中国人民的传教士。

他的口号之一是“中国归中国，中国人归基督”，他为中国教会努力争取的，便是中国教会的本地化。

有关教会本地化的问题，在梵二大公会议的文件中有很清楚的指示；在文件中也提到教会与当地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至于中国教会本地化及教会与中国文化的交流问题，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接见自由中国主教团时，已有很清楚的交代。

但这一切在几十年以前雷鸣远时代的中国教会，却并不如此简单和明显，雷鸣远神父是需要大力奋斗，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他根据“罗马对成立本地圣职的指示”和“世界大战中传教士逃难离欧来华的事实迫切”，尤其根据“只有本地圣职才能了解、深入并归化他本民族的灵魂”，极力主张“中国教会本地化”，但却受到中国教会有关当局的反对和排挤。这些人的宗教殖民地作风和修会地盘主义浓厚，加上又无意作出改变及存有种族偏见，使雷鸣远神父的理想受到挫折。然而，雷神父并不灰心，在中国时，他曾写信给教区主教表明中国教会内保教权应消除和培植中国圣职的必要；以后，他有机会到罗马亲向教宗和传信部长陈述中国教会状况和中国教会本地化的重要性。

终于在一九二六年，教宗比约十一世在罗马亲自祝圣了首任六位中国主教，为中国教会本地化奠定了基础。

我是天津人，原属天津老西开本堂区，在读小学和中学时，也常在教会当辅祭。

我的先祖父董郁青先生，当年受到雷鸣远神父热爱中国文化的感动，开始学习要理，并领洗入教，以后便留在雷神父身边，协助编辑“益世主日报”和“益世报”，并曾着有“新新外史全集”(一九二六年)等著作。

在不同时代，天主使不同的圣人智者辈出，完成代天行道的先知使命，发挥整风化俗的使徒精神。

在近代的教会史中，我们也看到比国两位划时代的先知先觉、大智大勇人物。

一位时贾尔定枢机(Card.JosephCardijn)，他创立了国际性职工青年会，尤其在提高在俗教友的地位，阐明在俗教友的使命及培育训练职工青年的问题上，有了决定性的贡献。

另一位是雷鸣远神父(Fr.VincentLebbe)。他热爱中国，在中日抗战时期为爱中国而捐躯。在中国教会历史上，他有更大的贡献。他创立了两个全球性的修会，两个国籍性的修会；尤其在建设中国地方教会上，他有重大的贡献。据闻教宗本笃十五世“夫至大至圣之任务”通谕中的诸多论点，也是援引自雷鸣远神父的函件。

“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这是雷鸣远神父的名言之一。

前者是前提和原则，后者是实现和结论。当时中国国家深受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压榨；中国教会全国也无一位中国主教。(一九二四年五月第一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主教会议，四十九位在中国各地的主教中，只有二位“监牧”是中国人，一位是在会议前五个月任命的，另一位是在会议前一个月匆匆任命的)雷鸣远神父有感而发的“中国归中国人”其实可从政治角度，也可从教会角度加以解释，但由当时问题的产生以至日后的发展，相信从教会角度看更恰当；“中国归中国人”也可改为“中国教会归中国人”的口号。

雷鸣远神父多么希望中国教会是一个中国主教的圣统、中国教会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以实现“中国人归基督”的理想！

(二) 梵二文件有关指示

有关本地教会的建立及本地教会与本地文化的沟通，在梵二文件中有很清晰的指示。

有关推动本地圣职人员的问题，文件上说：“每当各种教友团体能从自己的成员中，有了主教级、司铎级、执事级的救人的本地职员，为弟兄们服务，教会便在这些人群中奠下比较坚固的基础，如此则新生的教会就逐渐以本有的圣职人员取得教区的组织。”(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十六)

至于使本地教会和本地文化沟通，文件上也说：“在每一个所谓大的社会文化区域内，发起神学的检讨，可以看出各民族的习俗、生活的意义，以及社会秩序，如何能够和天主启示的道德相协调。这样就会找到在整个教友生活的范围内，进行深度适应的道路。这样作法，基督徒生活将会符合每一个文化的天赋特性，个别的传统和各国的优点，在福音光照之下，将会被纳入大公的统一中。新的地方教会，装饰着自己的传统，便要在教会的共融中，占有自己的位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廿二)

这种沟通和共融的进行，在传教学上称为“结合(本国)文化”(Inculturation)或者“结合(本国)处境”(Contextualization)。

“结合文化”是指把基督的救赎事业具体地实现于某一特定的国家和民族，或实现于某一社会文化处境的一种特殊进程。这也称为“本位化”，是涉及宗教信仰与本地文化的融合，透过本地人的思想、喜好、情操和直觉，也藉着本地文化的精神反省，实行天主的启示。

从神学观点来看，教会对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中所含有的真理、美善和正义的因素都极其尊重，因为通过文化的形式和发展，各国都可实现天主上智的计划，而圣言的种子——道”也蕴藏在各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

“结合文化”就是天主降生成人的具体化、现实化，复活的基督降生于各民族、各时代的文化处境中。这也称为“场合化”，即能使神学适应某一境况，如某一社会状况或政治状况等的作法或过程。

天主把自己完全显示给自己的子民时，就是通过降生成人的圣子耶稣，他是依照各个时代的特定文化处境而显现自己的。

有关中国地方教会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深感中国文化的优秀，在接见自由中国主教团主教及旅罗神父修女教友时，教宗指示说：“你们清楚了解，你们所要宣布的基督真理的对象，是在时空中存在的人民；你们身为中国的亲爱子民，你们的任务是将信仰的讯息，译成你们远近同胞所能了解的言词。要知道如何把教会信仰和信仰的表达方式，与其周围的文化相配合。这样做，教会不但尊重其文化，而且从它汲取更好的因素。(一九八四年二月廿八日)

自由中国主教团九位主教去罗马向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述职时，教宗强调中国人是归化中人的自然布道者，信仰并不影响其固有文化和对祖国的效忠。教宗说：“你们被召成为生命讯息的先驱。你们是以中国人的身份担任此职，而且你们发现接受信仰，绝非意味你们要放弃你们的文化，更不是要你们减少对你们祖国的忠诚和服务。你们的团体有责任，正如前任教宗保禄六世所说的“在全球共同为基督作证”，我加一句，就因为你们是中国人，你们是中国人家庭的天生福音传布者。(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八日)

这是近二十几年来，教会最高当局对本地教会及中国教会的态度，但这并不是雷鸣远时代中国教会的情况。一九二六年教宗比约十一世祝圣了六位中国主教以前，全中国就连一位中国主教也没有，但话说回来就连中国教会当局，也认为中国神父尚不到担任主教职务的阶段。

(三) 雷鸣远神父的努力奋斗

“中国归中国人”不但是雷鸣远神父的口号，他也极力推动建立中国本地教会；他认为只有由本籍圣职人员作主人才能奠定传教区的教会基础。

他的努力受到许多传教士，尤其是同会会士神父的反对，他本人也受到排挤。教区副主教曾将雷神父贬为堂区副理神父，后从天津被调职到正定，甚至到河

北东南端的小村镇，到不通晓当地语言的中国南方，最后更被调离中国返回欧洲。

雷神父热爱中国，又热心传教。多年来在中国传教所遇到的成功和失败、顺利与艰难，都令他深深感受到，要传扬圣教，拥有本地圣职是非常重要的。

法国在中国享有的“保教权”，是通过列强不平等条约所得的，这已使中国人对教会产生了种种的误解与不满，认为法国就是天主教，天主教就是法国。一些有名望的人曾说：进入天主堂就等于受法国保护；在对外传教的工作上，这实在是一个污点，一天不除去，他们就一天不能信奉天主教。可惜，中国教会当局本身未曾注意到这种对传教不利的情况。

传信部将中国不同地区交托给不同国家的修会管理，他们努力传福音，却未费心也未曾去想及如何培植本地圣职人员，更无心建立本地教会，以便将本地教会交还予本地圣职人员。

一切都是以自己的修会为主，将教区视为修会所有，而教区的主教、堂区的主任，也常由本国会士充任。

传信部对修会在传教区成立本地教会，培植本地圣职的使命皆有所说明和指示，但修会当局却不加重视，更未曾醒觉有建立本地教会的需要，他们依然抱持固有的态度和作风，我行我素；反而对愿意倡导建立本地圣职的雷鸣远神父加以无情的排斥。

更有些传教士由于种族偏见，认为中国人根本没资格升为主教以及中国的圣职人员准备不够，难以胜任主管教区。

这些不赞成雷鸣远神父“建立中国本地圣职”主张的传教士，本身已不赞成他的主张，再加上雷神父的坚持和大力推动，便引起他们对雷神父更大的反感，并施以更大的压力，最后雷神父被调离天津，更远赴中国南方浙江省的嘉兴、绍兴。

雷鸣远神父于一九一七年由嘉兴被调职到绍兴前，曾在教区赵主教 (Msgr.Keynaud)手中收到一份“教区思想备忘录”，以后，在周年退省中，雷神父给宁波的赵主教写了一封长达好几十页的长信，在这封信中他将自己对“中国归中国人”的思想，扼要清晰地加以发挥，对“建立中国本地圣职”有详细的陈述(信中也谈到爱国主义、保教权、道袍、事业与组织)。

雷鸣远神父在信中首先引证罗马针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指示。虽然雷鸣远神父谈的不多，但在信上他写道：“刚才收到的备忘录正好承认了“罗马教廷已给了我们指示”，而且数世纪不单是指示(参阅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及教宗良十三世的文献)，备忘录也证实了天主上智就在这时候，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向我们说话了。由此观之，结论没有前提的宽大，准备优良及众多本地圣职只是“现行”程序的一部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非唯一的一点。备忘录这个结论或

其类似的结论，虽然再三提及有关中国及整个远东的很多问题，但仍让我们传教区反罗马的现象保持原状。”(雷鸣远神父书信集二〇七页)

其实，罗马方面有关建立本地圣职的指示，不只限于教宗额我略十六(一八三一至一八四六)及教宗良十三世(一八七八至一九〇三)的近代文献。远在一六二二年，罗马教廷成立的传信部，目的就是要建立本地圣职，而传信部甫告成立，便于一六二二年建议晋升日本本地神父，一六三〇年建议晋升印度本地神父，一六五九年传信部给远东教会颁发的文件中，更明显表示对于在传教区祝圣本地主教的期望。

在这封长信中，雷鸣远神父也提到由于事情迫切，故应注意建立本地圣职的问题。

这是由于世界大战的发生，欧洲不能派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在信中，他只简略谈及此点，雷鸣远神父是这样写的：在承认“罗马的目的及普遍规则”是创立本地教会后，再加上已证实“欧洲”越来越不能供给“必要传教士的数目”，这就是说，虽然罗马没有表明意见，而事实却在说明，这力量有多么大！备忘录上又说：“结论是我们应该尽可能准备又优良又众多的本地圣职人员。“等天主上智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做罗马将指示给我们的事”。(雷鸣远神父书信集二〇七页)

根据北京教区传教年鉴上的统计数字，我们也发觉到一九〇〇年在全中国外籍神父的数目是 904 人，一九一〇年有 1402 人，一九二〇年减为 1365 人，一九二五年又升为 1776 人。雷神父的信写于一九一七年，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天，交通断绝之际。

究其实，雷鸣远神父坚持培育中国本地圣职，最主要的理由并不是“罗马的指示”，也不是“传教士减少”，而是“只有本地圣职(神父、主教)才能了解、深入并归化他本民族的灵魂。

(四) 雷鸣远神父的心声

请允许我引证雷鸣远神父针对这点亲笔写的话：“所收的备忘录中对成立完全国籍圣职，举出了两个切实的理由：罗马的指示与事实的逼切……教会整个的历史都给我们证明；只有本地圣职才能了解、深入并归化本民族的灵魂。在欧美没有见过一个国家，是在外国传教士管理之下而归化的……。”

由此推论出，传教士应该培养本地圣职人员，并应从较低的阶层开始；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直至从这个民族中生出领袖与主教。如果在一个地方不立刻开始实行，则永远也不会开始。过去人们做的好或坏也不重要，过去的就由它过去罢！然而，请您许可您这最小的孩子，以他最可怜且不堪当的心深处，给您坦白陈述一切他对于今天发生的事的想法。

尽管许多传教士，经过了许多个世纪的努力，牺牲了血与汗，但仍没有得到结果：仅仅形成了精神的殖民地，而没有依照宗徒们的榜样，成为有生气的教

会。本地圣职，永远是居于“辅助”的地位，在自己的本国，被看待如同外方人一样。

关于本地司铎，我们只准备他们作辅理本堂。有人坦白地承认，这是他们唯一的目标，至少会无限期地这样拖延下去。我曾听到不只一位主教如此说话，且也不止一次……我们从没有见过任何地方教会，能认真地朝向这目标迈进，虽然罗马已不知多少次给我们指出并讨论过。(雷鸣远神父书信集二〇六至二一〇页)

在长信的结论中，雷神父又写道：“人们最不愿原谅我的，恐怕就是由于我以为建立一个完全的本地圣职(主教在内)是我们的首要责任。由于教会的传统、罗马教廷的指示及事实上越来越清楚的呼声，也由于我曾在我四周努力传播这个概念，并表明，如果我能亲吻第二位中国主教的权戒，我将含笑九泉。”

这便是一位充满传教心火，又热爱中国人民的一位传教士写出的心声。

一人的归化或一民族的归化，是基于天主的圣宠所致，但归化的心理过程仍需要对所归向的宗教有一番钦佩敬仰之情，这样，又怎能以入侵的洋教或保教权的压力等姿态出现呢？

雷鸣远神父是一位勇于行，更偏重实际行动的人，他提出的三个支持“建立本地圣职”的理由也是从心理及社会，而非理论和神学的观点出发的。

赵主教是一位善良的主教，他十分同情雷鸣远神父的处境，亦支持他的主张，但对雷神父这封壮丽的书信，他只做了口头上的回答：“我没有工夫答覆你，如今当面答覆你，你说的都对都好。”但却没有实际行动或推动雷神父信中所论的各点。

这封长信的副本，以后却由雷神父的好友汤作霖神父(Fr.AntoineCotta)重写成一份六十六面的备忘录寄给罗马传信部，这引起了罗马的注意，更对日后雷神父被邀赴罗马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一九一六年天津老西开事件的发生，雷鸣远神父和好友汤作霖神父分别向罗马传信部写信报告有关“中国归中国人”的事件，事后雷神父于一九一七年被调离天津远赴绍兴，天津的教友遂向教廷直接申诉，因而引起罗马的注意。一九一九年传信部派巴黎外方传教会光主教(Msgr.DeGuebriant)来华视察中国教务，其主要任务是调查中国圣职能否担任主教，并且发出有关中国教务的问卷，令有关教友及中外神父答覆。

(五) 雷神父在欧洲为中国教会奋斗，为留学生服务

一九二〇年光主教结束了对中国教务的调查工作。而雷鸣远神父在一个与光主教谈话的机会下，提出了向中国大学生及知识份子传教的重要性，以及他自己的心愿。光主教则作了一反建议，主张雷神父离开中国，返回欧洲专为中国留

学生服务，所以在一九二〇年四月，雷鸣远神父与光主教一起从香港返回欧洲。

这是雷鸣远神父传教生涯的另一个转折点，在欧洲居留期间，他不但为旅欧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了不少服务，还为自己制造了日后亲赴罗马觐见教宗及拜见传信部长的机会。因此，他能够有机会向教廷方面当面陈述有关中国教务的种种，进而促成六位中国主教的祝圣。

在比国，雷神父与比国迈谢枢机(Card.Mercier)谈论过中国教会的教务和所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有关建立本地圣职的主张，并得到枢机的赞同和鼓励。迈枢机的支持和介绍，更促成雷鸣远神父的罗马之行。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雷鸣远神父被邀赴罗马向教宗本笃十五世及传信部长王劳松枢机(Card.vanRosuum)陈述有关中国教务的报告。

这种难得的机会，实在是天主对雷鸣远神父一番苦痛奋斗的酬报，使他又充满了无上的希望和喜乐。

雷神父曾给他的好友汤作霖神父写信，告知他这个喜讯及有关罗马之行的一切。

雷神父先描述他在十二月廿八日上午十时半，独自一人觐见教宗本笃十五世的经过，教宗先垂询天津灾民的情况，又谈到天津教会的事件，及后将话题转到“夫至大”通谕，雷神父感谢教宗对于自己所作的报告表示欣慰，教宗也表示，他是按照自己的职责发表言论的；而且，为本地圣职问题发表言论是教宗最热切的意愿。在谈到中国圣职人员当主教的资格问题时，教宗甚至嘉许雷神父已将一些神父的姓名提供给传信部长。临别时，教宗更捐出意币十万里拉给雷鸣远神父，以救济灾民，教宗向雷神父说：“我本愿多做些，但是我终于把我的一块面包与中国穷人分享了。”

雷鸣远神父也在“罗马之行”的信中，描述了十二月廿七日拜会教廷国务卿贾斯巴利枢机(Card.Gasparri)的经过，并发现枢机和他们二人的见解完全一致，也是主张建立本地圣职及祝圣本地主教。

至于在十二月廿一日拜见传信部长王劳松枢机的经过，雷神父在书信中也描述得十分详细生动。枢机向雷神父强调说：“很明显地，是应该有中国主教，教会在中国应该如同其他地方教会一样，假如有人也这样对待我们的国家，那我们仍然还是外教人(注：王老松枢机是荷兰人)。……我很希望第一位或第一批中国主教都能超越平常人，并愿他们给罗马的主张提出一个很辉煌的论证，至使反对的人只好闭口无言。以后我们可以增多中国主教，而第一批以后的那些主教们，就不再这样苛求了。”枢机也当场要他写出几位可被提名作主教的姓名。

至于对雷鸣远神父的服从，枢机当时更说出一些感谢的话：“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你所做的这一切，感谢你所遭受的这些痛苦，感谢你那有信德的服从。就是这服从拯救了一切……我感谢你在服从的德行上曾有足够的信德，使你居于人

下而无所怀疑；就人方面而言，你的服从似乎该招致一切祸害。但就在这里却有天主的祝福，现在你也看见你信服天主上智的安排是没有错的。(雷鸣远神父书信集二七九页)

以后雷鸣远神父又有几次拜见王老松枢机的机会，并且在雷神父的要求下，王老松枢机在他的照片上签名，加上日期，并写上“致可敬雷鸣远神父：在一切容忍和英勇中，工作如基督的好兵”。

(六) 教宗笃本十五与雷神父

教宗本笃十五世召见了雷鸣远神父，并在听罢他的看法后，决定要任命中国主教。原来，在一年之前(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卅日)，教宗已颁布了“夫至大至圣之任务”通谕，呼吁各地传教士培植本地圣职人员、本地主教和建立地方教会。教宗谴责一些传教士“将自己的国家置于天国之上”，使人误认所信仰的是传教士的教，因而使天主教在传教区内成了“洋教而非天主教”。

教宗本笃十五世虽然告诉雷神父，他必会任命中国主教，但是由于教宗的早逝，祝圣中国本地主教的理想要由教宗比约十一世去实现，在他被选为教宗的六个月之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委任刚恒毅总主教(Msgr.CelsoConstantini)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一九二六年十月祝圣首任六位中国主教。

雷鸣远神父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罗马不但公布了几百年来首批六位中国主教，将会由教宗亲自在圣伯铎大殿主持祝圣礼，且雷鸣远神父亦被邀请到罗马亲身参与这个盛典，在典礼中雷鸣远神父喜极而泣，热泪盈眶。

一九二七年雷神父更蒙新祝圣的孙德祯主教邀请，重返中国河北省安国教区传教，满全了雷鸣远神父“我为中国而生，我为中国而死”的心愿！

为推动建立中国本地教会，雷鸣远神父冲破万难，忍受了同会会士的排挤，以文字说明自己的看法和理由(致赵主教的长信)，以交谈说明了自己的见解和问题的严重(拜见教宗和传信部长)。在他有生之日，他不但看到理想实现了，而且更可以分享理想实现的成果，这正吻合中国成语所说的“苦尽甘来”。

在促进中国教会本地化的工作上，雷鸣远神父努力于中国主教的祝圣和华籍教区的成立，同时也注意到教会与中国文化的交流。

雷鸣远神父初到中国，便立志要好好读中国书，说中国话，清楚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一条心。雷神父坚持到底，每日读四书，练写字，几十年的工夫使他能写得一篇好中国文章，一手好中国字，且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雷鸣远神父以完全投入之情进入中国文化。

一九一二年雷神父在天津创办“广益录”，这是中国天主教的第一份中文周刊，以后改名为“益世主日报”，四年以后，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又创办了日报“益世报”，此报消息准确，言论独立，以爱国爱教，爱主爱人为出发点，内

容更触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且有不少独到之处，因此出版不久，便大受读者欢迎。

雷鸣远神父创办天津益世报的目的是为宣讲天主教教义，制造配合天主教精神的社会舆论。

早期的报纸曾刊登过不少宣讲天主教的文字。一九二八年起在第六版的五分之一篇幅，辟有“公教丛谈”，由安国真福院主编，每日刊登二千字，其中有的是雷神父亲手写的文稿，如“何谓天主，天主是谁？”“天主教存在之理征”等；一九三〇年在原版另辟“真道言”栏，转载“真道正言”一书，共八十三题，目的是要以天主教来取替中国社会对鬼神的迷信。

在一九三三年，第十版全版辟为“宗教与文化”专页，由上海徐景贤主编，介绍天主教的历史人物对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贡献，撰稿人有马相、陆征祥、陈援庵、徐宗泽等，目的是用天主教对中国文化科学的贡献来扩大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

可见雷鸣远神父在几十年以前，就不忘今日大家所提倡的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作“文化传教”的理念。

为使福音能打入社会，除文化活动外，雷神父也不忘“教友传教”的使徒事业。一九一一年式成立了天津公教进行会(初名传信善会)，其后更在多个地方成立支部，让教友负起传教的工作。这个组织迅速地推广到整个中国，有十七个教区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为方便统一指挥，组织遂定名为“中国公教进行会大同盟”(U.A.C.C.)，一九一四年在天津召开了首届全国公教进行大会。

针对教会礼仪中国化的理想，远在一九一三年雷神父在比国鲁汶参加礼仪周时，便向礼仪运动领袖博敦神父(Fr.Bauodouin)夸耀中国教友在圣堂以唱代念的祈祷方式，众口一心地颂扬天主。雷神父也表示如果弥撒主礼神父可用中文与教友进行弥撒，共同与天主交谈，那该是多好的事。

以后，雷鸣远神父在他创立的耀汉小兄弟会，开始每日诵唱中文翻译的神父日课经，并谱以额我略乐谱。

针对中国艺术、中国式圣堂及中国式圣像问题，雷鸣远神父也深感天主教本地化的重要性，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自数世纪以来，天主教的信仰已传入这美妙的国家，但这里的天主教会还没有在艺术学学理上和公教艺术的领域中占有地位，而只是抄袭欧洲的作品，并尽量与它一样。有人常以为从欧洲购买一切就够了。但是，中国艺术非常美，我的梦想就是使中国艺术经过教会的洗礼，使中国的教会在自己国家艺术的境界内，有个基督化的美术。”(雷神父书信集三五七页)

由我们上面叙述的各项事物，可以看到雷神父的理想和努力是多个层面的，就如他在信中所说：“我本来的目标是：日报，教友组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领导阶层的思想战，增高本地圣职的水准……等等”。总之，这一切都是雷

鸣远神父愿能通过“异途”以达“同归”，共求“中国人归基督”理想的实现。

(七) 最后的感言

诚如雷鸣远神父的高足赵雅博会长神父所说：“雷神父在中国的丰功伟业，实在是数之不尽，书之不竭的。然而在一切丰功伟业中，最大的事件，最大的功勋，乃是他加速了中国教会改变面貌。也就是说：他使到中国教会的外国面貌变成中国面貌。”

“在今天看来，人们认为仿佛不算什么，可是如果我们能明了中国传教区，乃至世界传教区昔日的情况，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一工作的艰苦，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工作的伟大。”(雷鸣远神父传二六二页)

为准备这篇演讲，我曾阅读多本有关雷鸣远神父的著作，尤其是雷鸣远神父的“雷鸣远神父书信集”和赵雅博神父的“雷鸣远神父传”。读毕这些著作，实在令我感触良多，我愿在结束这篇演讲时，将一些感想与大家分享，并以此作为演讲的结论。

自从一六七四年一月道明会士罗文藻受教宗克来孟十世委任为第一位中国主教开始，足足中断了二百五十年之久，直至一九二六年十月才有另一批六位中国主教祝圣；这还是雷鸣远神父和刚恒毅总主教努力的结果。

原本以为这扇门既已在一九二六年打开，日后便会有更多中国主教会受祝圣，可惜好景不常，中国教会本地化又一次被中断。

在一九四六年四月，教宗比约十二世成立中国教会圣统体制时，二十位总主教之中只有三位是中国总主教(田耕莘、于斌、周济世)，而一百一十三位主教之中也只有二十一位是中国主教。至于总数一百三十三位中国总主教及主教之中，就只有二十四位是中国人，但当时全国中国籍的神父却共达二千三百四十八位之多！

如果当年中国教会最高当局能在一九二六年之后，继续大力推动中国教会本地化，祝圣更多位中国主教，那末，今日中国大陆教会的情况可能会有改变，而不致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产生中共政权下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以求独立自主自办脱离教宗的中国地方教会。

任命中国主教的中断或缓慢，为中国教会本地化实在是一大打击！

导致任命中国主教和中国教会本地化进程拖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主教、神父)对中国修生和中国神父的不信任，他们认为中国人本质上或遗传上根本是不健全，不能担当管理教区的职务。而雷神父在致赵主教的信中一一驳斥这种不合理的偏见，并提出多位他认为有学识有品德的神父呢！

至于有人说中国圣职人员不成熟，根本没准备好，雷鸣远神父便为他们答辩说：“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好呢？……唉，不要如此说！人不知道，但似乎该试

一试。”如果假定现在的本地圣职人员程度低，全都不适于升任主教，那么，这是何人之罪，主办各地修院负责培育修生的传教士，又怎能洗脱他们疏忽失职的罪名呢？

上海教区龚品梅主教和广州邓以明主教都是在教难的时候，勇敢听命接受主教的任命。请看他们在教难的表现如何，还有许多位中国主教们，他们的壮烈忠诚、卓越智慧，难道不是众目所睹、令人钦佩，使我们引以为荣的吗？

另一原因是来自修会的封闭作风。中国的传教修会来自不同的国家(根据一九三四年“圣教杂志”，当时各地的传教士包括有来自法意德比班美荷加爱奥等十个国家)，由传信部托给他们，传信部原意是期望他们栽培本地圣职人员，建立本地教会。可是不同国家的修会竟将所托的传教区看作本国修会的殖民地(有如西方列强在中国若干大都市划定所谓“租界地”，在教会内也形成了一种修会地盘主义的租界地)，因而迟迟也未将教区退还给中国主教，以达到中国教会本地化的目标。

为避免这种现象再重演，雷鸣远神父与鲍朗神父(Fr.Balan)于一九二七年，创立了“辅助传教会”(S.A.M.)，严格规定自己会友在被派往任何传教区以后，要完全归属所在传教区的地方教会，成为当地圣职人员之一，并要在当地的主教权下服务，付出心血和力量。十年以后，在一九三七年雷鸣远神父又与彭师雷小姐(MissPoncelet)创立了“鸣远小姐服务团”(A.F.I.C.)，原名为“公教国际妇女辅助团”，这也是根据同一原则及精神为传教区的方主教服务。

教宗本笃十五世的“夫至大”通谕，教宗比约十一世的带头作用，以及罗马传信部的文件指示，各教区当局本可分辨出天主的圣意而知道要采取的正确路线，但他们却多次以个人或修会的私意压盖天主的圣意：虽热心传教工作，却以“舍我其谁”的态度，不信任中国圣职人员的能力，也不信任天主会补足人力的所缺，因而不愿致力将中国的地方教会交还给中国人，实在可惜！

在推动中国教会本地化的过程中，第一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曾与雷鸣远神父数度相会，他同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这是我阅读多册总主教的遗作“回忆录”后有所感的，可惜受着今日演讲的内容所限，在此未能加以发挥，十分抱歉。

最后，让我们感谢天主赐给我们中国教会一位刚恒而有毅力的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以及一位眼光远大为主奋斗的雷鸣远神父。也祈求这二位在天之灵会助佑我们正视我们的时代，如雷鸣远神父所说：“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潮流，我们不是要反时代，而是要遵信仰而合理地缔造我们的时代，引导我们的时代。”我们也身体力行，大力推进，在“中国归中国人”实现后，再力求“中国人归基督”的实现，以完成“现代中国的宗徒”雷鸣远神父的口号和心愿——“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

参考书目：

雷鸣远：参雷鸣远神父书信集(天主教耀汉小弟兄会)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天主教耀汉小弟兄会)

曹立珊：春风十年(圣化月刊社)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天主教主徒会)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罗渔、吴雁：大陆中国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记(辅仁大学出版社)

罗隆基：天津“益世报”及其创办人雷鸣远(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十二期：天津人民出版社)

Chanoine L. Leclercq: Viedu Pere Lebbe (Casterman)

R. Lauretin: Chine et Christianisme (Desclède Brouwer)

J. B. Wu Chung Yuan: Le Pere Lebbe et la recherche de l'identité de l'Eglise de Chine (Chiayi Taiwan)

(本文是董立神父为纪念雷鸣远神父逝世五十周年在台湾纪念大会所发表的演讲稿，刊于雷鸣远神父专刊第二集。)

1996年3月8,15,22,29日;4月5,19,26日及5月3日